現代中國大學的六個關鍵時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大學」是個高雅、時尚但又平易近人的話題，誰都想說，誰都能說上幾句；但要真想說好、說透，還真不容易。開口之前，先說三句閒話，以確立討論的前提。

第一，中國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學」和一百多年的「University」，二者並非同根所生，很難直接過渡。承認中國的高等教育歷史悠久，資源豐厚，但目前實行的大學制度，卻是道地的舶來品。因此，談北京大學的起源，不該從西漢說起；談原中央大學的故事，不該從南朝說起；談湖南大學的校史，也不該溯源到北宋的岳麓書院。這一點，目前學界及教育主管部門基本達成共識。

第二，校史溯源需實事求是，對於具體的大學來說，並非推得越前越好。很高興我先後就讀的兩所大學都能固執己見，屹立不動。北京大學咬住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沒有推到京師同文館成立的1862年——後者於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中山大學以1924年孫中山手創國立廣東大學為起點，只在溯源時談及此大學乃由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1905）、廣東公立法科大學（1905）以及公立農業專門學校（1909）、廣東公立醫科大學（1909）合併而成。相對於歐美諸多老大學，中國大學雖年輕，但有志氣，只要努力，總有一天能趕上並超越對方。因此，沒有必要挖空心思將校史前移。最近這些年，若干大學借重修校史而不斷地花樣翻新，我以為此風不可長，但此處不細談。

第三，為什麼要閱讀大學？幾年前，我曾專門分辨「上大學」與「讀大學」的差異，主張「不僅接受學校裏傳授的各種專門知識，還把學校傳播知識的宗旨、目標、手段、途徑，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來加以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或拒斥」。[1]在這個意義上，「大學史」、「大學文化」、「大學精神」是每個在校唸書或工作的朋友都應該多少關心的話題。

暫時擱置校史溯源方面的爭議，就說中國人向西方學習而創辦現代大學的這一百二十年間的是非曲直、功過得失。為求簡單明快，這裏選用六個蘊含巨大能量且充滿戲劇性的「關鍵時刻」來加以描述。唯一需要說明的是，有些事件對中國高等教育影響十分深遠，但更適合於在政治史上論述，這裏從略，比如反右運動或文化大革命。本文討論的現代中國大學史上的六個關鍵時刻，包括1905年的廢除科舉、1919年的學生運動、1937年的大學內遷、1952年的院系調整、1977年的恢復高考、1998年的大學擴招與爭創一流。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版權的資料

一、廢除科舉的功績

科舉制度的弊端，此前多有揭露與批評；但真正的變革，不能不從戊戌變法說起。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召集軍機全堂，下詔更新國是，變法自強。不只光緒皇帝之「改革宣言」着重談教育，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總共上了三十七封奏摺，其中三分之一涉及廢八股、興學校、派留學、選人才。稱戊戌變法乃是以教育改革為突破口，當不為過。這是因為，晚清士人普遍相信，教育落後，乃中國屢戰屢敗的癥結所在。百日維新雖然以流血告終，可康梁等人主張的新政實際上仍在悄悄實行，廢科舉、開學堂更是大勢所趨。1901年張之

1 參見陳平原：〈閱讀大學的六種方式〉，初刊《解放日報》，2009年2月9日，收入《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洞等奏請「分鄉會試中額，以為學堂所中舉人進士之額」；[2]1903年張百熙等奏請「自下屆丙午科起，每科分減中額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額減盡以後，即停止鄉會試」；[3]到1905年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校」，疏入，奉上諭：「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4]至此，自隋代開始，實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壽終正寢。撇開意識形態的紛爭，二十世紀中國教育的大格局，其實是在晚清一代手中奠定的。

為什麼晚清的政治及教育改革，必須落實在廢除科舉，袁世凱等人1905年奏請立停科舉摺說得很實在，也很清楚：「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因此，「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5]廢除科舉的上諭發佈不久，嚴復在上海的環球中國學生會演說，稱：「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6]此舉關係重大，當初雖不無抱怨，但反抗力量其實很小，因為從封疆大吏到維新志士，大都予以認同。

這裏引三位閱歷、立場及趣味不太一樣的重要人物——章太炎、林紓、嚴復——看他們如何談論廢科舉、開學堂。1906年，章太炎作〈與王鶴鳴書〉，從早年的攻擊科舉，一轉而為挑剔學校的諸多弊病：「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時俗所數稱道者。遠睹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2 參見張之洞等：〈籌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摺〉，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上冊，第53頁。

3 參見張百熙等：〈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摺〉，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61頁。

4 參見〈清帝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66頁。

5 同上，第63、64頁。

6 〈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見《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一冊，第166頁。

自上建之則日衰。」[7]這裏所批評的，不是學校作為一種教育體制的優劣，而是因其得到朝廷的提倡而可能成為新的利祿之途。終其一生，章太炎堅持在野立場，對「暴政」與「利祿」對學術的雙重摧殘有深刻的體會，因而對朝廷興學的誠意及效果抱懷疑態度。也就是說，認準「學在民間」的章太炎，[8]其批評興學堂，並不意味着對科舉制度有所迷戀。

五四時期與新文化人直接衝撞的林紓，在晚清可是堅定的維新志士。1907年，林紓在〈《愛國二童子傳》達旨〉中稱：「強國者何恃？曰恃學。恃學生。恃學生之有志於國。尤恃學生人人之精實業。……今日學堂，幾遍十八省，試問商業學堂有幾也？農業學堂有幾也？工業學堂有幾也？醫業學堂有幾也？朝廷之取士，非學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則已視實業為賤品。中國結習，人非得官不貴，不能不隨風氣而趨。」在林紓看來，只有學生們願意攻讀實業，才是國家之福。因此，「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學生請治實業以自振」。[9]可讓林紓意想不到的是，正因新式學堂日漸注重「實業教育」，這一時代潮流，反過來促使林紓等傳統文人日漸邊緣化。

最值得仔細觀察的還是嚴復。嚴復本人1879年留學英國歸來，第二年被李鴻章聘為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十年後任總辦（校長）。對於這位並非「正途出身」的嚴復，居上位者不能不用，可也不便重用。因為，那個年代，科舉成功是人才最主要的標誌。「咸雲科目人，轉眴皆台閣。不者亦清流，師友動寥廓。」[10]這種尷尬的處境，迫使嚴復不得不多次參加徒勞無益的科舉考試。直到科舉廢除後的1909年，嚴復方才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不版權申請

7 〈與王鶴鳴書〉，見《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四卷，第152頁。

8 參見陳平原：〈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載《學人》（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第二輯。

9 參見林紓〈《愛國二童子傳》達旨〉，載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113–115頁。

10 〈太夷繼作有「被刖」諸語見靳，乃為復之〉，見《嚴復集》，第二冊，第368頁。

被欽賜文科進士出身。讀〈見十二月初七日邸鈔作〉，不難體味嚴復苦澀的心境：「自笑衰容異壯夫，歲寒日暮且踟躕。平生獻玉常遭刖，此日聞韶本不圖。」[11]正是這種屈辱與不平，使得嚴復對舉業深惡痛絕。1895年嚴復撰〈救亡決論〉，開篇就是：「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也。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12]1898年，嚴復〈擬上皇帝書〉，痛陳「破把持之局」，同樣專門以科考為例。[13]因此，對於廢除科舉，嚴復雖然只「言其重要」，沒做更多的價值評判。但我相信，他內心深處是十分贊同的。

廢科舉，開學堂，是那個時代開明人士（包含封疆大吏）的最大共識。當初中外媒體一致叫好，日後歷史學家也多是高調讚許。但最近十年，學界風氣有所變化，或以科舉制度對漢文化圈諸多國家以及西歐國家啟蒙運動的影響來為其鳴冤叫屈；或抱怨廢除科舉使得讀書人離心離德，最終導致清廷的覆滅；還有將儒家文化失落、道德人心淪喪歸之於廢科舉。我就想說一句話：科舉制度的史學研究，與晚清廢科舉的價值判斷，二者不能混淆。說絕對點，沒有晚清的廢除科舉，就沒有二十世紀中國大學的輝煌。

科舉的作用是取士，至於育才的工作，主要由書院或學校承擔。我對二十世紀中國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賞，但對其拋棄悠久的書院傳統則深表遺憾。十多年前，我曾專門撰文，從教育體制、教育理念以及教學方法的角度，談論傳統書院教育如何成為今日中國大學改革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14]那是另外一個重要話題，這裏從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

11 〈見十二月初七日邸鈔作〉，見《嚴復集》，第二冊，第378頁。

12 〈救亡決論〉，見《嚴復集》，第一冊，第40頁。

13 〈擬上皇帝書〉，見《嚴復集》，第一冊，第76頁。

14 參見陳平原：〈大學之道——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初刊《嶺南學報》，新第1期，1999年10月，收入《大學有精神》（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二、學生運動的得失

學生運動古已有之，只不過名稱不一樣而已。歷代雖有嚴查學生干政的禁令，但太學生們的政治激情卻從來沒有熄滅，這與其一身繫天下興亡的自我定位有關。1903年的拒俄運動中，京師大學堂師生集會抗議，慷慨激昂，表示「要學古代太學生一樣，『伏闕上書』」。在這「北大學生爭取自由的第一幕」中，[15]雖有「伏闕上書」的動議，但其讀禁書，喜演講，發通電，以及事後有人走向社會，組織武裝等，均非漢宋太學生所能想像。當然，真正讓「學潮」名載青史，且得到後世史家高度評價的，還屬1919年爆發的以北大學生為主力的五四運動。

學界談論五四運動，一般包括思想啟蒙、文學革命與政治抗爭。可在我看來，五四運動除了文學史、思想史、政治史的意義，在教育史上同樣具有里程碑作用。具體說來，那就是經由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論述，確立了日後被廣泛認可的「大學精神」。蔡先生的大學觀，若用三句話來概括，第一句是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16]這句話，直接針對的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做官發財思想」。第二句是1919年〈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中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17]一般人注重思想自由，我卻更看好兼容並包——後者是一種制度性保證，比個人的思想自由更為可貴。北大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大學，就在於相對來說比較能「包容」，因而顯得「大」。

與這兩句廣泛傳播的名言相比，第三句很普通，但更值得關注：「我並不是說學生應完全的不參加愛國運動，總要能愛國不忘讀書，讀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版權所有

15 參見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載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第24頁。

16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見《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三卷，第5頁。

17 〈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見《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1頁。

書不忘愛國，如此方謂得其要旨。至若現在有一班學生，借着愛國的美名，今日罷課，明天遊行，完全把讀書忘記了，像這樣的愛國運動，是我所不敢贊同的。」[18]在大學校園，反對閉門讀書，能獲得某種道德優越感；而反對青年學生盲目干政，則可能引火燒身。五四運動後，對蔡元培校長造成巨大壓力的，不僅是腐敗的政府，還有日漸激進的學生。對於學生因政治熱情高漲而放棄學業，以及因意識到自家力量而過多使用罷課等非常手段，蔡元培憂心忡忡。這一點，蔣夢麟在《西潮》中有很好的描述與闡釋。[19]

蔡元培執掌下的「有容乃大」的北京大學，各種新思想、新學說得到較好的培育與傳播，大學也因此深深介入了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建設。理想的大學，不僅僅追求學問與養育人才，還探索精神、服務公眾、參與政治，乃至直接影響社會進程。談論現代中國「新教育」、「新文化」與「新政治」三者之互相激盪，不能迴避「鬧學潮」這個敏感話題。

五四以後，「學潮」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現代中國的歷史舞台。這可是把雙刃劍。我們不能只談讀書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崇高，而不談實際政治運作的複雜，比如，「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20]便是個很難擺脫的陷阱。具體到教育史寫作，大陸學者談「學潮」，僅限於民國年間；至於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故事，只能三緘其口。

這就說到了大學史與政治史之間隱微而深刻的矛盾。比如，關於北大傳統的詮釋，便明顯取決於敘述者的教育理想。從注重學術，到突出政治，轉折點是在1949年完成的。對照《國立北京大學五十週年大事年表》與日後撰寫的或詳或略的北大校史，可見其間巨大的差異。在「新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18 〈讀書與愛國——在杭州之江大學演說詞〉，見《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123頁。

19 參見蔡元培：〈讀書與愛國——在杭州之江大學演說詞〉及蔣夢麟：《西潮》（台北：世界書局，1962），第十六章「擾攘不安的歲月」，第96–101頁。

20 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框架中，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構成了北大校史的主線；而校長們極力網羅眾多全國第一流學者，以及其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學研究方面的貢獻，在校史中只能「退居二線」。半個世紀的重寫歷史，使得蔡元培創辦於1922年、開啟了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對於今日的北大人來說，已經不是耳熟能詳。[21]反而是後起且短命的清華國學院（1925–1929），因明星匯集，成績顯著，構成「一個頭尾完整、充滿懸念、略帶幽怨、可以寄託各種情懷的學術傳奇」，而吸引了更多公眾的目光。[22]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三、大學內遷之壯舉

最近二十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與傳說逐漸發酵，[23]得到學界以及民眾的一致讚許。可是，八年抗戰，中國大學大規模內遷，一路弦歌不輟的，遠不只三五所明星大學。戰前中國大學共108所，經歷最

---

21 參見陳平原：〈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以蔡元培與研究所國學門的關係為中心〉，初刊《文史知識》，1998年，第5期，收入《老北大的故事》（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22 參見陳平原：〈大師的意義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初刊《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六輯，收入《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

23 參見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聯大八年》（昆明：西南聯大學生出版社，1946）；西南聯大校友會編：《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笳吹弦誦情彌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週年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北京大學等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張寄謙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張曼菱總編導：《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7）；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